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 鲜明特征与理论意义

周 文 白 佶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伟大实践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眼于解决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现实问题,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开放性和发展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回应了我国经济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也为破解世界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专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来源与重要特征研究”(JZDZ005);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重点任务研究”(23ZDA030)。

[中图分类号] F124,D6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5)008-0006-018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5.008.001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和方针政策,科学回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和战略路径等重大问题,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完善,不仅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实践遵循,确保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行稳致远。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于引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此,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

作者简介: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白佶,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着力破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对特定历史阶段重大课题的深刻回应。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广阔的时代背景、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坚实的实践基础。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实践的深刻回应,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把握,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1]¹⁷。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较量、治理体系变革与科技革命的交织,共同构成了这一变局的多重张力,使世界经济体系、治理模式和发展范式面临深刻调整,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第一,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仅构建了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还主导了全球金融体系和规则制定,推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全球传播。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东方转移,形成了新的力量对比。尤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债务负担加重,经济治理面临结构性困境,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凭借稳健的增长态势,逐步提升其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尽管“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发显著。据统计,2022年,全球南方主导的金砖国家GDP首次超过全球北方的七国集团^[2]。同时,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在世界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份额翻了一番,现已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与此相适应,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丝路基金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制也逐步走向成熟,进一步优化了国际金融资源配置,推动着全球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包容、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注入了持久动力。

第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演变。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实力格局相一致^[3],大国之间的竞合关系对政治格局有决定性作用^[4],这一基本规律决定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动态演变。伴随世界历史的演进,多极化趋势加强,世界力量走向总体均衡,国际权力中心发生历史性转移。尽管西方国家在政治理念、价值观输出、制度设计和舆论引导等方面依然具备一定的优势,但其在内部凝聚力、政治领导力、国际感召力以及战略前瞻性等关键能力上正逐渐减弱。与之相反,全球南方与新兴市场国家集体觉醒,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展示出越来越强的团结协作精

神。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全球南方开始突破传统的西方主导模式,寻求更加平衡和多元的国际秩序。金砖国家(BRICS)实现历史性扩员、非盟正式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亚太区域一体化程度加深、77国集团和中国(G77+China)在全球治理议题上深化合作等,进一步巩固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力量加速洗牌。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拓展,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增长机遇,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南方的崛起。这一趋势堪比又一次非殖民化运动,不仅推动了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也促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多元化和包容化。

第三,国际新旧秩序加速变革。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既无法反映绝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也不能有效筹集满足各国家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这种低效甚至是失灵的表现,使得全球治理机制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大幅下降。新兴经济体要求增加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传统大国则试图维护既有利益格局,导致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进程缓慢,变革的压力和需求日渐增长。面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自身在既有世界秩序中的相对优势逐渐削弱,收益空间缩小,故而在全球治理中采取保守甚至逆全球化的态度,动辄退群、毁约、脱钩,俨然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的“蓄意破坏者”“麻烦制造者”,并试图根据自身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偏好,在世界上构筑各种“小多边”“伪多边”^[5],使得传统国际治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世界裂痕加深,全球治理面临有效性和包容性的双重考验,碎片化、无序化状态进一步发展。事实上,“多元化自由世界秩序”的理念比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一元论的观点更加真实和站得住脚^[6]。国际社会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逻辑束缚,就必须积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多元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从“少数主导”向“共商共建共享”模式转变,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可持续运转的国际治理新格局。

第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近20多年来,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出系统化、突破性、叠加式的演进态势^[7],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不断积蓄力量,催生各种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全球产业格局、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既重塑了各国经济竞争力消长和全球分工格局,同时也改变了原有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结构^[8]。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焦点,不仅决定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深刻影响着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和国际格局的演变。科技的加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国家间的竞争,也使国际科技合作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面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公共卫生安全等),国际社会需要加强技术合作与规则协调,以确保科技创新能够造福全人类。然而,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部分国家推行科技封锁、产业链“脱钩”等单边主义措施,破坏全球创新生态,增加了科技发展和国际治理的不确定性。如何在促进科技创新的同时确保其发展符合人类共同利益,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9]¹⁰。意味着我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历史方位的转变,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生根本性跃升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必须紧扣时代脉搏,深刻把握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趋势、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特征,充分认识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蓬勃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精准研判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对国际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确保持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速一度达到两位数,然而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和要素红利的递减,传统依赖投资、出口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经济增速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这一转变不仅是经济发展理念的升级,更体现在经济运行机制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深层变化上,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不再单纯追求 GDP 的快速增长,而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效益、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形态正在向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的形态转化,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结构都向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在转向新动能驱动和新的增长点^[10]。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据统计,2025 年上半年,内需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68.8%,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 52%^①,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步由外向型、投资驱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进一步提升,2015 年首次超过 50%,2023 年达到 54.6%,连续 9 年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②。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业态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逐步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成为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促进我国经济从依赖传统产业和低端制造向创新驱动、科技引领的新经济形态转型。

第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和市场化改革,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1]⁴⁷⁶,大部分领域“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更加突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问题仍待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我国发展目标需从“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发展方式需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政策取向需从“效率优先”向

①王珂,王云杉.扩大内需,主动力愈发强劲[N].人民日报,2025-07-21(1).

②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地位作用更加彰显 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新中国 75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EB/OL].(2024-09-11).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9/content_6973779.htm.

“公平与效率并重”调整。要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步伐,从经济总量扩张向经济结构优化转变来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迈进^[12]。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缩小发展差距,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第三,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3]664},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与经济格局。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持续突破,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不断提升,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率持续提高,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形成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的新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水平虽迈上了新台阶,但在研发经费、研发强度上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显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仍面临基础研究薄弱的挑战^[14]。同时,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科技领域实施“人才封锁”和“技术封锁”,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突破技术瓶颈的难度。为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打破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就必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推动前沿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并且,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还需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第四,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和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从经济视角来看,中国经济总量在 2024 年首次突破 130 万亿元,经济总量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左右,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2024 年,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超过 40 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 15 年保持全球第一,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就对外投资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连续保持世界前列,2023 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2.96 万亿美元,连续七年排名全球前三,境外企业覆盖全球超过 80%的国家和地区,投资领域持续多元,近八成投向四大领域^[15]。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和数字经济发展,为沿线国家提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深化了与全球市场的互联互通。从科技视角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研发投入第二大国,2023 年全社会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 2.64%^①,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持续上升,5G、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前沿科技产业全球领先,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计算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科技创新进入全球第一梯队,逐步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创新中心”迈进。总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步走近中心,国际影响力、引领力、感召力增强,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人类问题的解决作出更大贡献^[16]。

①余惠敏.向新:创新动力勃发奔涌[N].经济日报,2024-02-28(1).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是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集中体现。它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阶段性特征,系统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是指导新时代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实践性: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根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特点和新挑战,积极应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矛盾与新问题,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构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深刻回应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和外部环境变化的现实需求,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模式也需要相应转型。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与挑战,创造性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新发展理念侧重于解决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内外联动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旨在通过创新驱动破解传统增长模式的要素瓶颈,以协调机制重塑城乡、区域、产业间的动态平衡,将绿色低碳转型嵌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过程,依托高水平开放构建内外循环协同的新发展格局,最终指向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18]。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和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不再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求。加速推动我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升级,实现发展动力从单纯的要素投入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跨越,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11]164}。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着力解决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加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确保供给能够更加精准和高效地满足市场和社会需求。这一重大战

略部署,使我国经济的增长不再单纯依赖规模扩张,而是更多地依赖质量效益的提升,为我国逐步走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新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不断根据时代变化和社会需求优化和调整现有的制度框架,破除体制机制中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性梗阻,通过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动态适配,实现“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发展动能”的良性传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影响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性问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11]528}。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科学性:善于运用科学方法指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19],它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深刻的认识工具和有效的行动指南。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中,面对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经济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实际,精准把握我国经济工作的运行规律和实际需求,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工作的战略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论原则贯穿于各项经济政策的设计与执行中,实现了宏观战略与中观微观实践的紧密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自信自立”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精神,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依赖自身的力量,探索出适合中国的现代化路径,而非依赖外部力量或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强调,“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20]19},这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自主创新、独立发展的重要宣言。这一理念不仅强调经济领域的自信自立,更延伸到文化、科技、制度等各方面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在国际环境复杂化和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唯有通过加强自身实力、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高质量发展。

“守正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品质,强调在继承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推动新时代经济学说的创新和进步。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在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的前提下,充分意识到创新对国家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实现创新发展^[21]。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观点,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等,为我国灵活应对国内外变化的挑战、确保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提供了科学指导。

“问题导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工作方法,强调理论和政策的制定应紧密围绕当前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20]²⁰。针对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找准关键症结,提出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围绕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系统谋划和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着力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难题。无论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都是在精准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基础上作出的战略部署。

“系统观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原则,强调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时,必须树立全局视角,统筹兼顾,注重各领域、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动态变化。新时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复杂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谋划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统筹考虑不同领域的互动效应,“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22]。进而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稳定和创新之间的动态平衡,确保各项政策举措形成合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效能。

(三)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23],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自觉地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1]⁴¹²,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¹¹。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从单纯的“有没有”发展到“好不好”,这一变化反映了人民需求具有多层次、多样化和多方面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4]²³⁴,要“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24]²³⁴,“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4]⁹。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始终是为人民谋复兴、谋幸福、谋发展,各项工作都紧紧围绕人民的根本利益,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和长远福祉,确保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25]。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通过不断完善民主制度、加大改革力度和强化创新支撑,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了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极大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注入了新的力量。与此同时,我国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坚持和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优质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可观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好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和更丰富的精神生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升了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开放性:以全球视野谋划战略布局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演变,全球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保持经济健康稳定,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着眼于国内经济转型,更要着眼于全球化时代的互动和合作,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打造更加多元、开放、包容的全球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26],推动构建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持续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签署了近200个自由贸易协定,累计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数字经济等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不同于西方传统大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始终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深化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全球发展的国际环境,培育新的全球发展新动能。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双重标准做法,始终倡导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力求更好地惠及全球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363},为世界和平发展增加稳定性和正能量。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动者和贡献者,我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金砖国家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27]。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更具积极性和建设性的角色,进一步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可持续和普惠的方向发展。

(五)发展性: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空前繁重,国内外矛盾、风险与挑战层出不穷,治国理政的考验极为严峻。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23],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和不断拓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系统回答了经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9]30},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中国从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的传统经济模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支撑。这一转型不仅回应了传统增长模式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和经济结构性矛盾,也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4]24}“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8],增强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系统构建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战略目标的理论体系,明确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实施方略,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1]12},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优势所在。如今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范围之广、涉及领域之宽、攻坚难度之大、联动效应之强,前进的每一步都需要面对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挑战。在此

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9],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包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以更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为全面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保障。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意义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为破解世界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一) 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习近平经济思想根植于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深刻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科学回应了时代发展的课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目的和社会公平的理论内涵,构建了系统化的发展理论框架,超越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实现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科学定位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时代发展大势,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推动新时代社会生产力跃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从内涵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实现原创性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30]。它不是对传统生产力的简单延续,而是建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基础上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突出特征。它不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催生了新型生产关系和产业组织形式,加速了经济社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演进,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深化了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不仅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

科学指引,也为全球范围内破解发展困境、探索可持续增长模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31],任何社会制度的变革,归根结底都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基于这一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将人民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理念不仅贯穿于党领导人民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32]789}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32]789},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经济政策,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差距,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和均等化,减少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逐步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确保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更加稳固,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其一,创新发展理念是对发展动力理论的深化与拓展。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3]664}。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4]24}“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11]144}等一系列论断,深刻把握了创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创新从微观的企业竞争层面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发展动力的理论。其二,协调发展理念是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关系理论应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协调,更拓展到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等多个维度,形成了系统性的协调发展观。其三,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诠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3],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要义,更创造性地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统一起来,突破了传统发展观中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范式。其四,开放发展理念是对世界市场理论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开放发展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的基本观点,又根据新时代特征进行了创新性发展。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举措,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五,共享发展理念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化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提出“坚持人民至上”^{[34]53},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领域,更贯穿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的各个方面。

(二) 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这一变革要求调整发展思路,以更加系统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理念引领经济变革。习近平经济思想精准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目标,提出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以数字经济为增长引擎,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第一,以科技自立自强为动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35]。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36]。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益加剧,技术变革深刻重塑经济格局,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与竞争优势越来越依赖于自主科技创新。因此,必须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使其成为引领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从而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夯实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和主动权。同时,要坚持开放创新,以更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国内科技创新能力跃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自主创新的良性互动。

第二,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11]364}。这一过程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联动效应。一方面,必须将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优化供需结构,提高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配性,增强国内大循环的自主性和韧性,确保经济循环畅通高效。另一方面,要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贸易投资结构,深化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竞争力。通过深化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形成“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37]的发展模式。

第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38]。这一改革不仅关注短期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更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强调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传统要素的密集型投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创新环境,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推动经济从资源和要素驱动向创新和智能驱动的转变。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还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为重要抓手。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34]206},其核心在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驱动,重塑经济增长模式、产业发展形态和社会运行方式,赋予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动能与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融合,能够重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活动全流程,形成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进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同时,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优化数字营商环境,促进数字贸易发展,以更高水平的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三)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并非少数人或少数发达国家的专属进程,也不是单一模式或部分国家的特权,而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多维度、多样化的文明进步过程,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下的多元发展路径,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实践证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11]480}。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经济实力和制度创新,迅速成为全球现代化的主导力量,通过殖民扩张、资本输出和规则制定等方式,将其现代化模式推广到全球,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然而,西方文明在全球凯旋之时,却正在经受其内部的危机,而它的完成揭示的却是它自身的贫乏^[39]。西方现代化进程以资本为核心驱动力,其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伴随着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资本高度集中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固化加剧;经济运行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物质主义思潮盛行,使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与此同时,产业空心化趋势明显,部分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就业岗位减少、实体经济衰退等问题。“西方之乱”表面上看似偶然事件的叠加,实则是各种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这种乱象源于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交织叠加,反映了其治理体系和发展模式的深层困境。

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简单替代,而是在立足自身国情、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充分尊重自身历史文化积淀与现实国情,同时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展现了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多元文明的包容与创新。它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所固有的内在缺陷,突破了单纯以工业化、市场化、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现代化逻辑,形成了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统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可行路径,拓展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理论视野和实践道路。

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往往通过资本垄断、技术壁垒和制度性约束,维持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结构性支配,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对发达经济体的依附。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开放的同时,致力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公平变革。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使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演进。这一模式不仅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心—外围”结构的束缚,摆脱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低端的锁定格局,同时也推动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多极化发展。

作为近代以来非资本主义国家成功探索出的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的内涵和发展路径,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的传统叙事,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单一线性发展”的固有框架,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新范式,揭示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选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并不在于它提供了现代化的“国际标准”,而在于它代表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坚持从国情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同时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积极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经验,走出了一条让世界瞩目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40]。实践证明,西方只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而不是现代化的唯一范式。世界各国应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和社会现实,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实现更加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

(四)为破解世界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失衡加剧、全球治理滞后等多重挑战,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时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在此背景下,习近平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突破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为破解世界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第一,突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西方经济学普遍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视为“外生性关联”,即政府仅在市场运行失灵时发挥补充作用。即便是主张政府干预的经济学流派,依然强调私有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优势,认为政府干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仅是市场机制不足时的补充性手段,而非经济运行的核心要素。这种“市场至上”的思维模式,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时存在一定局限性,尤其在应对市场失灵、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平等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变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突破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成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学范式的重要方向。不同于西方“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中探索出了独特的发展路径,构建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关于政府干预与市场自发调节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实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在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为之间的动态平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不仅为国家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体制活力与制



度保障,深刻启示了各国的经济治理实践,更印证了现代市场经济与原始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政府作用^[41]。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并非旁观者,而是通过制度供给、战略规划、政策引导等方式,在推动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社会福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破解逆全球化困境。随着世界多极化势头日趋强劲,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快速崛起,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步向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转移,世界经济的南北差距呈现缩小趋势。然而,部分西方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对其产业、就业和收入分配造成压力的情况下,直接转向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去全球化”“去中国化”,试图通过限制自由贸易、提高关税壁垒等手段来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割裂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倒退。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42]。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1]302}。通过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南北经济互动和跨国投资合作,打破部分地区和国家由于逆全球化政策导致的经济孤立,保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高效运行。

第三,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次变革与挑战,中国基于对时代趋势的科学研判与国际格局的系统分析,以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定力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优化。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3],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利益深度融合,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全球性挑战,更无法回避加强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唯有深化多边合作,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共赢的方向发展,才能实现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体系的积极参与者,更是国际规则的贡献者、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国际合作的引领者,通过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引领科技治理等方式,中国在多个领域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优化,不仅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提供了新动力。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不仅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不足的回应,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深刻反思,这种治理创新使全球治理从单一的权力博弈逐渐转向更加注重全球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破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 李安山.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23):21-34.

- [3]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99.
- [4] 刘建飞,张南燕.当代世界政治基本问题[M].北京:大有书局,2023:71.
- [5] 刘世强.世界秩序变革趋势与大国治理能力提升[J].人民论坛,2024(21):88-91.
- [6]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M].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66.
- [7] 张志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智库使命和智库建设[J].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4):1-12.
- [8] 王一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创新[N].经济日报,2022-10-31(10).
-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裴长洪,赵伟洪.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创新[J].经济学动态,2019(4):3-17.
- [11]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12] 张占斌,钱路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学理逻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6):37-41,187.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4] 周文,李吉良.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J].社会科学辑刊,2024(2):114-124.
- [15] 中国政府网.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B/OL].[2025-02-02].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9/content_6976216.htm.
- [16] 陈金龙.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若干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17(12):4-9.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 [1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4.
- [19]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J].求是,2023(2):4-9.
- [2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1] 王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和世界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8):108-119.
- [22]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求是,2019(1):4-8.
- [2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1).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58.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99.
-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734.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6.
- [2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30] 周文,白佳.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力跃迁与生产关系变革[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31-142.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4.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71.
- [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 [36]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N].人民日报,2023-03-06(1).
- [37] 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1(1):1-19.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99.
- [39] 哈佛燕京学社.全球化与文明对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135.
- [40] 周文.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5):17-27.
- [41] 周文,司婧雯.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上海经济研究,2022(1):27-36.
- [42] 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
- [43]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91.

The Context,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ic

Zhou Wen Bai Ji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ic i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form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rand strategy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world unseen in a century. It is root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always adheres to integrat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cusing on addressing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fac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tage. A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ic embodie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ity, scientificity, people-centeredness, openness, and development. It profoundly responds to a series of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only does it provide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ut it also offers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for addressing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ic;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杨果)